

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丛书

安明刚◎主编

比较视野下的 遵义会议精神

BIJIAO SHIYE XIA DE
ZUNYI HUIYI JINGSHE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丛书

比较视野下的 遵义会议精神

BIJIAO SHIYE XIA DE
ZUNYI HUIYI JINGSHEN

安明刚◎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视野下的遵义会议精神/安明刚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4
(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8972 - 8

I. ①比… II. ①安… III. ①遵义会议(1935) - 研
究 IV. ①K264. 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4596 号

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丛书 比较视野下的遵义会议精神

主 编 / 安明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编辑 / 刘 翠 单远举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178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972 - 8

定 价 / 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是基于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遵义会议精神研究”
(项目批准号 13@ZH042)的子课题“遵义会议精神比较研究”
的最终出版成果。

《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陈敏尔

副 主 任 谌贻琴 张广智 刘奇凡

成 员 白芳芹 侯正茂 徐 静 姚 远
官喜祥 吴大华 郑 强 宋晓路

首席专家 徐 静

专 家 组 陈 晋 高永中 肖裕声 徐占权
郝立新 彭 红 柳建辉 宋毅军
李东朗 徐 圻 唐福金 陶渝苏

本书主编 安明刚

副 主 编 余福仁

编 写 组 陶渝苏 张 清 陈艳波 王胜军

总序

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研究提炼、传承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根本遵循。

遵义会议是发生在贵州地域上的重大党史事件，中共贵州省委历来高度重视对遵义会议的研究，2013年明确由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牵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课题申报于同年12月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在首席专家徐静的主持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共完

^① 《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强调：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 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

成由一个总报告、五个子报告构成的项目研究成果，并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验收结项。本套丛书正是在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的。丛书集研究性、资料性为一体，堪称目前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方面最系统、最完整、最权威的成果，代表了目前全国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这是全国党史界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丛书的可取之处在于，不是把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局限在遵义会议召开的这三天时间内，而是把遵义会议看成以遵义会议为中心，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沙窝会议等共同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遵义会议精神则主要是这一期间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内形成的宝贵精神。从中国革命精神的构成来看，遵义会议精神应是井冈山精神的延续，是延安精神的起点，是整个中国革命精神的一个重要链接点。

丛书的可取之处还在于，不是把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炼局限在政治学的学科视域内，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为基础，从精神的主体视角、要素视角、动力视角、时间视角、空间视角等进行多视角解析，从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一时代需要出发进行多方面思考，坚持历史性与现实性、党性与民族性、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原则，研究视野开阔，成果学理性强，结论令人信服。

丛书的可取之处更在于，不是把遵义会议精神的价值局限在某一个历史的节点上，而是在阐释其历史价值的同时，

注重从探索中国梦的精神引领、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添人类历史文化重要遗产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总结出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正是因为这样，这一研究课题的重点不仅在于总结和凝练精神，更在于传承和弘扬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突破性成果，集中体现在把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初步提炼为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敢闯新路、一往无前等，这一表述，既广泛汲取了历史上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精华，更与时俱进地增加了对遵义会议精神时代价值的评价，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学理支持，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实证空间。

坚定信念始终是推进党的事业不断胜利的根本。80年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处于极度危险和困难之中，但我们党从来没有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面对强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的悲观失望和张皇失措，表现出了超强的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党通过召开遵义会议等系列会议，及时纠正“左”倾错误，从而实现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仍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还需要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实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牢固树立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实事求是始终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思想方法。80年前，“左”倾教条主义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苏联模式和经验，致使中央红军遭受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遵义会议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清了长征以来的大是大非，抓住主要矛盾，作出正确抉择，解决了当时最突出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又一次恢复和弘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惊叹的辉煌成就。今天，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独立自主始终是探索中国道路的重大原则。80年前，我们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依靠自身力量纠正了“左”倾错误，克服了重重困难，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全面开启了不同于俄国的中国革命道路。从那以后，独立自主精神的弘扬，就已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常态。今天，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夺取新胜利、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胜利之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奋斗。

民主团结始终是党充满生机活力的法宝。80年前，遵义会议很好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正确地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形成了党的光荣传统，战胜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实现了全党全军和各族群众的大团结。今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大力弘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号召力、向心力，保证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敢闯新路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80年前，遵义会议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作出正确抉择，善于转变、敢于突破、勇于胜利。今天，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许多新的特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继续发扬敢闯新路的政治勇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正确引领新常态，在新常态中实现新发展，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一往无前始终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制胜法宝。80年前，面对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党和红军没有退却，而是通过召开遵义会议，冷静地自我剖析、研判形势、应对挑战，充分体现出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狭路相逢勇者胜！凭着这份豪情壮志，红军不仅战胜了敌人穷凶极恶的追杀，还战胜了恶劣自然环境的制约，更战胜了内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今天，在迈向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遵义会议彰显出的伟大精神鼓舞和激励着我们，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只要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2015年是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这套丛书的出版为纪念这两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历史节点献上了一份厚礼。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我谨以此序对这份厚礼的呈送表示真诚祝贺。



2015年9月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目 录

一 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形成及本质特征	1
(一) 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形成	2
(二) 遵义会议精神的本质特征	24
二 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华民族传统精神	48
(一) 遵义会议精神与儒释道经典	49
(二) 遵义会议精神与其他国学经典	59
(三) 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华历史典故	69
(四) 遵义会议精神与传统文化遗存	80
三 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	102
(一) 遵义会议精神具有中国革命过程中关键 节点的鲜明个性	102
(二) 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 部分	108

2 比较视野下的遵义会议精神

- (三) 遵义会议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比较 124

四 遵义会议精神与西方近代革命精神 160

- (一) 遵义会议精神与英国革命精神 160
- (二) 遵义会议精神与美国革命精神 171
- (三) 遵义会议精神与法国革命精神 188

五 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 198

- (一) 改革开放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继承 198
- (二) 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228

参考文献 261

一 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形成 及本质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 90 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政党性质、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需要、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精神。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史也是党的伟大精神形成史。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五个重要历史节点或重要地域来看，形成了五个重要的革命精神。即党的诞生地上海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精神、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井冈山精神、党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遵义——遵义会议精神、中国革命的灯塔延安——延安精神、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西柏坡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一部分。

遵义会议精神是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战胜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战胜党内“左”和右的错误、战胜险恶的自然环境，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形成的。其间伴随着从第

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的失败到抢渡乌江、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一系列军事胜利，伴随着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沙窝会议等以遵义会议为转折标志的一系列会议的召开，伴随着爬雪山、过草地等战胜险恶自然环境的伟大壮举。它的形成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关，其自身有一个产生与发展的过程。遵义会议精神形成的过程，不能局限于会议召开三天时间，也不能局限于从长征开始到结束的一两年，从其前因后果来分析，可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即最终实现了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从中国革命精神的构成来看，它应是井冈山精神的延续，是延安精神的起点，是中国革命精神的一个重要节点。追溯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形成过程，有利于把握遵义会议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

（一）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形成

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实现伟大转折，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初步形成阶段；第二阶段：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开始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至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肯定

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进一步确认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会议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是遵义会议精神的正式形成阶段。

1. 遵义会议精神的初步形成阶段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排挤和打击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干部，对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1933年9月，蒋介石经过充分准备，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红军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红军由于同广东地方实力派军阀谈判达成协议，较为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虽然突破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

价，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大部分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余人锐减至 3 万余人。^①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左”倾路线领导人在 1934 年 12 月 4 日决定红军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12 月 5 日，中央红军各部开始继续西进，11 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攻占通道县城。这时，蒋介石已完全知道中央红军转移的意图与转移的路线，又在红军北去湘西路途上的靖县、城防、绥宁、会同一带调集了 14 个师共 16 万多人的兵力，布成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在中央红军的背后，尾追红军的桂军 2 个军约 6 万人也紧跟到通道以南的湘桂边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左”倾领导者仍然坚持要中央红军北上到湘西去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并命令各军团首长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让苦战两个多月、战斗力异常弱的红军，去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硬拼，其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在这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力主放弃原定的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方针，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1934 年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城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进军方向问题。博古（作为党中央临时负责人，虽缺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 384 页。